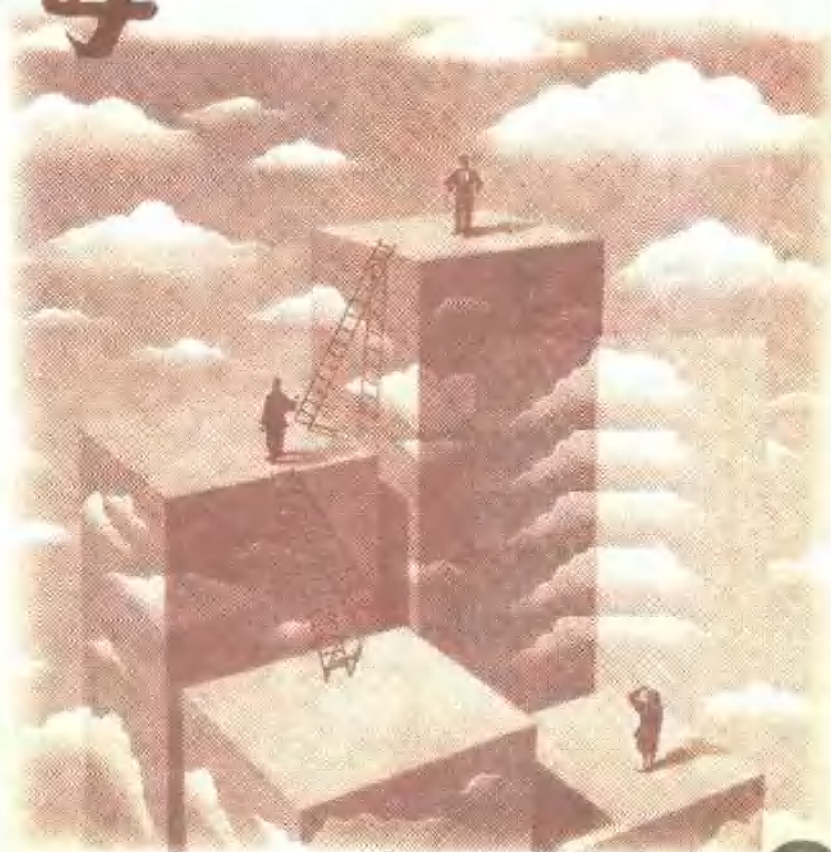


辞海

C i h a i
新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



NO.6



罗·马普勒索普 / 在圈内的人

第 六 辑

□ 现 代 化

- 俞吾金 反思现代化理念 ····· 2
- 丁建弘 现代化：时代的标志与时代的精神 ····· 9
- 陈 勤 现代化与革命——世纪末的反思 ····· 20
- 钟家栋 目中有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追求 ····· 30
- 陈晓律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 37

- 伍贻康 钱运春 福音抑或祸水——论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47
- 王曙光 道德中性与道德关怀——《道德情操论》读书随笔 ····· 56
- 金 磊 对西部大开发的冷思考 ····· 64

- 杨志玖 我对《光明之城》的初步观感 ····· 69
- 姚大力 雅各是另一个马可·波罗吗？ ····· 75

- 袁伟时 我们要持守怎样的传统——《“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编后絮语 ····· 81

- 吴 炫 怀旧文化批判（上） ····· 87
- 章 渡 重读阿城 ····· 93

■ 文 谭

- 刘 刚 儒教骑士辜鸿铭——读《中国人的精神》 ····· 100

董太和 张 遇 梅香犹冽 雪林长青 ····· 103

■ 阅读

唐克明 学会简单生活——《瓦尔登湖》读书笔记 ····· 109

■ 信笔

陈 村 一月日记(节选) ····· 117

■ 补白

任 太 公司公民 ····· 124

叶文宪 古人讲什么话 ····· 125

参
考
文
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海新知.6 李伟国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0

ISBN 7-5326-0706-2

I. 辞... II. 李... III. 百科全书-中国 IV. Z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3610号

《辞海新知》编辑部

主 编: 李伟国

编 辑: 吴雅仙 赵嘉红 冯 涛

《辞海新知》第六辑

责任编辑: 吴雅仙

版面设计: 杨钟玮 明 婕

封面设计: 杨钟玮

出 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26-0706-2/N·14

定 价: 6.80元

编者按:

美国作家詹姆斯·莱德菲尔德所著《塞莱斯廷预言》一书,称早在公元前6世纪秘鲁就有人预言,到20、21世纪之交,人类将会对自己的生存真谛有一种警醒。不论是否真有这么一个跨越数千年的预言,今天的我们确乎深刻地反省着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否合乎进步的自然法则?又,究竟哪一种新知能改变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其实不必说得太远,就眼下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无论其思想、过程 and 方向如何变幻,如何富于中国特色,到今天有一点已是国人确定不移的共识,那就是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

然而,这并不是靠一句口号就能做到的。我们的前辈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付出了无数的艰辛,甚至是血的代价,近二十年来,我们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实力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曾经为东方文明古国傲立于世,令全世界所向往,但近两个世纪以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或阻碍了她的巨人步伐呢?现在,在我们开始腾飞的时候,又应该如何把现代化之路走得更扎实、更稳健,不重复西方的错误,而更富有中国的特色呢?

我们可以在因特网上感受到世界脉搏的跳动,我们可以及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这个世界,拥有这个时代。

让学者们来剖析,梳理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吧——

现 代 化

反思现代化理念

俞吾金

现代化的两次反省

什么是现代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使用现代化这个术语。毛泽东约二十年前，1933年7月《申报》副刊《现代》第100期，发表《现代问题》一文，共约10万字，探讨现代化问题。有学者认为：“就个人与物品言，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今日的人与物，如果真比从前的好，那就是现代化了。但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联系。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日本的政治，不是纯粹的民主，日本的宗教，更不是耶稣。所以我们说日本现代化了(modernized)，即是说日本工业化了(industrialized)，这是现代化适用于国家社会之较狭的意义。工业化为其一切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按照这种见解，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会自然而然地现代化。

至于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当时大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仍和农村经济的破产。……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甚至指出，“从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目前最紧急的对策并不是在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在怎样救亡的大计上面。”依此观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为前提的，而既然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讨论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也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化的困难，我以为在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才；在物质方面是缺乏资金。”（同上）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的发展，资金的积累要逐步摆脱外资的控制，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国民资本。所以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政治上的清明和经济发展上的计划性。而这个关键因素恰恰又是不确定的，这就使现代化的讨论失去了它的坚实的基础。

比较起来，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因为它涉及到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念进行反思的第一个高潮。在这里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既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是不现实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参与这场讨论呢？答案只有一个，即这场讨论不是理智型的，而是情感型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首先不是从理智上认识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而是从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切身感受中体验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提出现代化概念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当代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第一次反思与其说是理智探索型的，不如说是情感感受型的。胡适这样写道：“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同上）他的本意也许是想贬低这场讨论，事实上却抬高了这场讨论，因为他始终把这场讨论理解为理智上的认真的探索，实际上，这场讨论主要是情感上的发泄而已。

第二次反思的高潮是在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时代，“四个现代化”就是当时关于现代化的统一的提法。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邓小平在阐释四个现代化理论时，主要提出并解答了四个问题，即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性质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什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十分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与他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呢？是科学技术，邓小平甚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他强调发展科学技术、首要的问题是教育，而要大力发展教育，进一步改善教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待遇，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是当务之急。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其实就是著名的“小康”目标。此外，要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根本的问题就是稳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平的国际环境。

与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反思相比，七八十年代的这次完全是理智型的，而且显示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仅如此，七八十年代的思考明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并以科学技术为其关键，反映出现代化理念反思的强烈的时代特征。但两个不同时代的思考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把经济建设和大规模提高生产力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这也几乎成了学者们的共识。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还是抽象的、片面的，真理应该是具体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席豪饮，而因为每个豪饮者离开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所以整个的这场豪饮也就同样是一种透明的和单纯的静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二、世纪交替时期的新反思

同前两次反思连续起来，可以把我们正在进行的反思看作是第三次高潮。它比前两次更富于活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获得新的、强大的动力的前提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何谓新的历史条件呢？这即是90年代初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三个新的、根本性的要素：

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变数。如果说,在对现代化反思的第一次高潮中,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问题还不可能被涉及,那么,在第二次高潮中,邓小平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思考现代化问题的。但在90年代初,他对现代化的思考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架,正如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邓小平文选》)这一突破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把人们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上,而且由于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化问题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二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整个视野大大地超越了工业时代,从而也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化的理念。按照传统的理念,现代化也就是从以往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工业化,至少在现代化反思的第一个高潮中,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代化的内涵正在急剧地变化着。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创造一个新文明》中说:“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在他看来,流水线作为工业时代和传统的现代化理念的象征,已经失去了意义。90年代初以来,电脑和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和信息传播、遗传工程和无性繁殖、电视和电讯、航空和航天事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科技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把中国的现代化学理解为工业化或四化(四化中的第一化也是工业化)都显得不合时宜了。

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60年代已见端倪,在七八十年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潮虽然在80年代已经传入中国,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真正发生重大影响却是在90年代。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与现代化的追求相一致的现代性的价值体系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从而也形成了对传统的现代化理念认同的批评和超越。这就告诉我们,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讨论乃至反思整个现代化的参照系都改变了,这个新的参照系就是后现代主义。换言之,在今天谈论现代化,再也无法回避后现代主

义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了。

正是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现代化的理念在我们的心目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至少推动我们去思考并解答如下的问题：

第一，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对蕴含在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主导性文化价值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那么作为后发国家，我们还有必要去追求现代化的实现吗？我们认为，仍然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不但由传统的现代化理念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只要我们不被完美的乌托邦理解所支配，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价值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而且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诫我们，后发国家是无法绕过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对后发国家来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价值的批判，有利于它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合理因素的汲取，而使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但如果后发国家竟因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批判而放弃了现代化的道路，甚至使自己心甘情愿地停留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那就未免显得太幼稚了。

第二，能够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来代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说，在70年代初，即“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还有其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今天继续沿用这个口号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所着眼的是物的因素，尽管其中蕴含着人的因素，但它所注重的并不是人的因素本身，而只是人的因素的物化。虽然物的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人的因素。这个道理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换言之，实现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对这个道理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比如，人们如果缺乏相应的道德方面和法律方面的素质（欠债可以不还，签合同可以不加履行，办事可以不讲信用等等），那么市场经济显然是无法运作的，现代化也完全是一句空话。

第三，能够说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吗？以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在当代生活中不

再是一种中性的、价值上中立的东西来说，我们就不能片面地把科学技术视为现代化的关键。海德格尔说过：“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某种中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以某种最坏的可能性被交付给技术了，因为今天人们特别愿意接受的这种观点使我们对于技术的本质完全处在茫然无知的状态下。”（海德格尔《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在他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显现于“座架”（Gestell/enframing）之中，这种“座架”既体现出人对自然或物的强行控制，也体现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整个人性的物化。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负面作用，人们就不得不对传统的、以单向度的方式肯定科学技术作用的现代化理念作出新的反思和修正。美国另一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我们周围的高科技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革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奈斯比特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高科技和人的情感之间需要一种平衡，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尚不全面。真正全面的思考应该涉及到：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对科学主义泛滥的遏制来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在新的现代化理念中，决不能固守“技术决定论”的立场，而应当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倡导紧密结合起来。

第四，能够把现代化建设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建设吗？以现代化涉及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来说，把它仅仅归结为经济建设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背景下从事经济建设的，所以单纯的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不存在的。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曾反复重申：“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然而，80年代末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被淡化了，凸现出来的是政治稳定的问题。诚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但真正长远的稳定仍然要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正确地理解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把它作为反思现

诚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但真正长远的稳定仍然要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正确地理解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把它作为反思现代化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环节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可能是健康的、充满希望的。

代化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环节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可能是健康的、充满希望的。

与二三十年代的感情型反思和七八十年代的单纯政治型反思相比较，滥觞于90年代初的反思虽然也注重其政治维度，但它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综合性的、以广阔的文化视野为契入点的反思，因而也就蕴含着对现代化理念的全新的、批判性的梳理、思考和预测。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定要认真汲取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和现代化价值导向时提出的合理的观念，这并不等于我们的立场要完全漂移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去，并不等于要牺牲我们自己的立场，甚至退回到对传统的、前现代的立场的维护上；从文化生态学的立场来看，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亟需协调好入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这一历史进程的健康发展；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的来看，它具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强有力的渗透，这种渗透有其合理的一面，即它为政府在经济、金融等方面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不合理的一面，如以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活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因此，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话题。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通过现代化理念的批评性反思，确立合乎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化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现代化：时代的标志

与时代的精神

..... 丁建弘

一、现代化理论：“进步”观念的现代发展

本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70、8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西方学术界，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学者，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众说纷纭的见解和论断。但它们有一些共同基点：

第一，研究的重点对象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本身，而是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70年代关注的焦点是拉丁美洲，80年代关注的焦点已移至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在多数西方现代化论者看来，不发达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唯一的道路和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发达国家那样，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

第二，“现代化理论”大都立足于17、18世纪以来西欧北美工业化经验的概括与抽象，提出西欧北美工业化发展的模式理论，作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出路。美国社会学家S.N. 艾森斯塔德说得明白：“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

美类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S. N. Eisenstad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 牛津1966年版，第1页）

第三，“进化内因论”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特征。他们提出“内在性变迁过程”的标准模式，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而阻碍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因，也在其社会内部，即缺乏进步的动力——“追求现代化的意志”。所以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来说，从外部输入西方文化和新的价值观念，“激发”追求现代化的热情，被视为最重要的环节。

第四，普遍采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思想来解释社会的进化，把前现代社会统称为“传统”阶段，同“现代社会”相对照，发展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化。美国社会学家T. 帕森斯推出了“模式变项”理论（参见T. Parsons,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新泽西1966年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社会结构功能理论，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可以通过调整结构来使功能需要获得满足的社会变迁理论，内中突出了“两极对立”的特征，它被西方现代化论者普遍采用。

第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论（参见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纽约1965年；W. W.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与现代化政治发展目标的“可相容性”假设（参见S. 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化论者所列举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即民主化；另一是由工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即工业化。这两者之间发展的结合程度和平衡程度，就构成了某一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特点。但是这种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究竟能够“化”到何种程度，它的前程和结果是什么，则是西方现

代化论者的新课题。

总起来说,西方主流派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是社会进化论,它也是在传统进化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它并不完整,并无严密的科学体系,却是一种“进步学说”,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表现在它提出:现代化是一种时代趋势,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增长经济”,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及力图把西欧北美诸国特定的现代化工业化原则抽象提升为超历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的努力。

西方主流派现代化理论提出:现代化是一种时代趋势,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增长经济”,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力图把西欧北美诸国特定的现代化工业化原则抽象提升为超历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

现代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起到了某种“启蒙”的作用。但是人们也指出,现代化理论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该理论源头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作为“楷模”的西欧北美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性质。70年代出现的“依附理论”及与之有联系的“世界体系理论”(参见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America*, 纽约1976年版)曾对现代化理论展开批判。依附论学者认为需要打破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对欠发达国家的束缚,实现国家自主的目标(参见I.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 第1、2卷, 纽约1974、1980年版)。但是他们仅仅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和与外部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可能性的理论。此类争论和批判从政治角度考虑有其正确性,即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前提必须是独立自主,但也易于陷入误区,就是把现代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全都抛掉。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本身是时代的趋势,现代化本身并不具有何种性质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战后民

族独立国家，或者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现代化，只是哪个阶级的统治才给它的现代化“道路”打上某种“性质”烙印。

在这里，弄清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来龙去脉就显得非常必要。人们大都承认，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发展学说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种发展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进步”，是“进步观念”在现代意义上的一种发展。

有关“进步”观念的思考，可从两个基本判断入手。第一，“进步”最先只是西方人的“大观念”，以后则在世界范围流行，成为人类的“大观念”；第二，“进步”观念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其历史性。为真正进步思想的上升奠定基础的是15、16世纪以来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宗教的反叛；另一个是地理大发现和科学开发世界。这两大事件都明显地展示了现在超过以往的成就，而且奠定了“进步”观念的社会和现实基础。生当其时的一些人类思想家，运用进步的事实，建构进步观念，提出今胜于昔的信念，恰恰为欧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鸣锣开道。

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时代的起点。社会变迁的浪潮荡漾着旧社会的污浊，而新兴的工业社会秩序尚在建立过程中，社会的急速发展与动荡也呈现出深刻的危机，于是有了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有了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一种以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为特征的“进步”观念成熟起来，在法国的社会学和德国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中达到了高峰。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一百年时间里，大多数社会哲学都以科学自居，视“人类进步”为必然，把一般对于“进步”的信念变成对于“规律”和“法则”的认识和发现。人们把“进步”观念归结为一种直线的和量的进步观，它由于生物学理论的突破和传播，终于摧毁了旧时代信仰的最后藩篱，远播世界，深入人心（参见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纽约1932年版）。然而也正在这个时候它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是代表19世纪末社会进步观念的英国社会学大师斯宾塞和代表20世纪初社会进步观念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斯宾塞等人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当

斯宾塞在坚持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沿着线性的阶段升进时，他也就背弃了此前“进步”观念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他重视社会结构的进化，而不是理性主义者所强调的思想状态的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把社会进化的乐观思潮一扫而空。战后世界性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大危机，使19世纪的历史进步观念严重地动摇了。现代工业文明走入歧途，西方文明面临深刻危机，人们对现代化世界未来前景的疑虑超过了信心。韦伯正是带着这种悲观的社会思潮来论述他的社会进步观的。这位理性主义社会学家，一方面对“科学理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提出“实践理性”的合理化观。他毕生致力于探讨的主题，就是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及其前途，或者说是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的品格及其命运。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研究，被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理解成“韦伯命题”：“只有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非西方社会由于缺乏“新教伦理”之类的内在因素，所以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命题”也就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并进而推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是无法自发现代化的、必须从外部输入现代化。

“进步”观念终于作为遗产进入20世纪。“进步”不仅遭受外部危机，也面临着内部的衰落。所谓内部衰落，是由于人们领略到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惊人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对于人类进步的不断失望。一种悲观的辩证法甚至认为，科学的进步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工具[参见P. J. 欧皮茨：《“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夏季卷总第8期，第186—187页]。依我看，这种社会批判理论，针对的并非是作为“时代大观念”的“进步”本身，而是它当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和完全依赖于科技的发展观。所谓外部危机，主要表现在“进步”观念的政治化分裂。美国和苏联都把自己看成是进步的代表，不仅仅代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代表社会与政治的进步，都认为自己的“发展”是样板。

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由“进步”观念发展而来的。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历史上持“进步”观念的资产阶级学者，都站在“进步”的立场上，